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RANSLATION

翻 译 学

——问题与方法

〔联邦德国〕沃尔夫拉姆·威尔斯 著

祝 珏 周智谟 节译
南 木 审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年 北京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by

Wolfram Wilss

1982. Gunter Narr Verlag Tübingen

据联邦德国蒂宾根1982年英译增订版节译

翻 译 学

问题与方法

〔联邦德国〕沃尔夫拉姆·威尔斯 著

祝 珏 周智谟 节译

南 木 审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4.625印张 字数: 98(千)

1989年10月 第一版 198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001-0083-3/H·28

定价: 1.70元

出版说明

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这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争论未决的一个问题。沃·威尔斯教授在所著《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主张，并在检验和评估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翻译的性质及有关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探讨了建立“翻译学”的可能途径和设想。这是威尔斯在联邦德国萨尔州大学应用语言学、笔译和口译系多年执教和从事科研工作所取得的一项可喜成就。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界流派林立，可谓硕果累累，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未能形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理论体系。这显然由于翻译活动本身受到多种可变因素的制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原故。威尔斯的论著可以说是新兴的翻译学派的一部代表作，可供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和有关理论研究者的参考。

原著先是用德文写成，于1977年问世；后经作者修改增订，译成英文于1982年由联邦德国蒂宾根的(Gunter Narr Verlag)出版。全书除引言外，共十二章。为了适应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根据上述英译本，将其中的主要章节（即原书的1-7章，参见中译本目录）译成中文（对所译各章视情况有所删节），以飨读者。由于这部分涉及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繁多，新的术语和概念层出不穷，以及主要以德英

两种文字的转换为例证等情况，在翻译与审校过程中出现欠妥和失误之处必定难免，尚祈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1988年9月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翻译——现代信息传递的工具.....	8
三、	翻译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17
四、	翻译学的方法论问题.....	44
五、	翻译过程和翻译程序.....	70
六、	话语语言学与翻译.....	103
七、	翻译等值问题.....	124

一、引言

现代语言学在当今被看作是一门主要研究信息传递的学科。这个新发展可以追溯到语言学开始摆脱生成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和生成语义学的倡导者)的束缚的时候。现代语言学返回到索绪尔的路子,日益重视对符号学中的词、句、话语等各个层次的研究,便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方向性转变。开拓语言学这个领域,探讨实际语言的现象,意味着包括近三十年来东方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家越来越深入探索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课题——翻译。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工具业已变得极其重要了。五十年代蓬勃开展起来的有关机器翻译的种种实验便是例证。于是,翻译理所当然地一跃而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尤其成为共时性描述比较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主要课题。与此同时,翻译本身也产生出一股向前发展相当充沛的自我动力。

将翻译方面涉及的问题纳入现代语言学的科学发展过程,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贝特霍尔德·布雷希特把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称之为:“一大堆看法”,我们将这话略加改动,也可以说过去几百年来有关翻译的种种论述不过是一大堆不相协调的议论而已;尽管其中颇有一些精辟见解,却始终未能融会

贯通起来，成为大家一致公认、在学科之间站得住脚的翻译理论。如果在1800年以后的几年中能将当时威廉·冯·洪堡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二人创建的比较语言学与翻译学结合起来研究，那么，早在那个时候就具备系统探讨开拓这一学术领域所必须的最有利先决条件了。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对这两位学者所开辟的研究途径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也未形成一种体现有方法论观念的对翻译学的全面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冯·洪堡去世后，翻译界又重新陷入纯理论的空谈：究竟是应该使译作去适应原作，还是相反，应该使原作去服从译文？这种空泛的议论一直在翻译界起着主导作用，压倒方法论方面的研究。

这两派论点的支持者轮流垄断着翻译理论界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种对问题的模式化讨论才有可能成功地变为合理研究翻译问题的方法，在具体的话语范围内研究翻译的过程。可是，要从带有深深哲学烙印的规范性翻译理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建立起专门的翻译学，却非一日之功。恰恰相反，随着五十年代语言学各方面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小心翼翼迈进的步伐，翻译学的一些概念和术语才慢慢发展起来。从那以后，翻译学的地位一直很稳固，所以说现在翻译学已有条件来谈论自身的目标了：“翻译学不仅要提出事实，而且要致力于就语言学这个领域作具体的阐述”(Jaeger 1972)。

翻译这门科学形成的具体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部分原因是它必须通过研究大量具体问题才能深入到一个复杂的学科课题。这就引起了方法论上举棋不定的情况：不知应遵循什么特定的研究模式，也不知应按什么顺序去研究问题，加

上在研究翻译学的人当中既不满意也不知如何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翻译学又不愿弄清其与语言学领域内诸如现代语法学、语义学和实用语言学等一些不成熟理论的关系。这些情况对于翻译学如何以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石，系统制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调研计划，是很不利的。

翻译学要是没有翻译机器问世这一突然轰动全球的事件加以促进，恐怕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一门隶属于共时性描写语言学而又具有独特专门领域的学科。

机器翻译尽管耗费了大量资金和智力投资以及大量时间，并过早地加予它许多桂冠，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不过，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促使翻译学认清了自身的发展方向。任何从话语出发试图尽量科学地、准确地描述支配语际翻译的种种因素并由此总结机器翻译原则的人所遇到的方法论上的巨大困难，都在这一失败过程中暴露无遗。翻译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很难说清楚的，难就难在翻译乃是语言行为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要对翻译（更确切地说，是对组成翻译的转换过程）进行科学的研究，从广义上说就是进入了话语语言学的范畴。

就性质而言，翻译作为语际行为语言学有以下有关方法论方面的考虑：翻译学既不是理论部分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研究方面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它以灵活的方式处理话语问题，试图回答原文可译还是不可译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效果是否等同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它不具有控制论系统那种稳定性和绝对性。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现代科学理论按自然科学模式所要求的客观性并在程序方法上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

因此，其研究成果只能部分加以形式化和数学公式化，也只能部分运用于实践。由于它的特点，翻译学与那些更多着重系统化的其它语言学学科相比，就更加难以获得认识论方面的基础，从而对翻译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作出恰当的描述。这是因为翻译过程涉及到要对翻译具有实际意义的形形色色原文做出抉择的过程，这就会导致方法论方面的麻烦。如果翻译学能将语言实际现象进行抽象化那样归结为一种简化过程，那么，这些方法论的麻烦便最终可以消除掉。然而，这样做又会产生很大的弊病，迫使翻译学忽视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

翻译学因此处于十字路口，面临方法论上的种种问题而无所适从。假如翻译学要坚持彻底摸清翻译全部错综复杂的本质，那就得去描写一个事实上无法描述的对象。假如翻译学倾向于从事理论性探讨，那么，在方法论上就会一无所获，研究出来的成果对以实践为主的翻译学关系不大。

可是，当初尽管冒着不重视方法论研究的危险，现代翻译学一开始仍旧首先致力于创建一种可靠的理论，置所涉及到的两种语言于不顾而分析翻译的过程，于是便提出一套描述翻译过程的模式。这些模式一部分着眼于语言学，一部分着眼于信息学。这种理论化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尝试，目的在于将翻译行为分解为若干因素，并尽量弄清翻译过程中各种不变因素之间的关系。看来，这种对翻译过程作启发性模式化的工作业已暂时告一段落，因为目前还缺乏现成的方式方法，通过更细致地区分语际翻译能一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存在的途径，以加速形成有关翻译过程的理论。再说，归纳出一些比眼下所知道的更多关于翻译过程本身的一般性假说，是

否会实际上大大增强我们解决翻译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也还没有把握。

面临翻译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局面，我们有必要扩大方法论的视野。因此，本书采取的不是演绎推理而是经验归纳的路子，其总的构想以此为前提，即认为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翻译研究必须针对与两种具体语言有关的实际问题。至于如何解决有关检验翻译科学中理论问题的方法，则只限于在有必要澄清描写性的疑难和实践中的问题时才加以讨论。因此，本书的宗旨是在理论的基础上对翻译学进行实际调查。这样做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

一、必须以对翻译行为(对语际话语分析和综合)的描述来补充对翻译能力(对语际话语的理解和复制能力)的描述，后者只着眼于模式而不涉及任何一对特定的语言，前者却着眼于翻译中的具体困难并经过观察对一对特定语言的翻译行为作恰当的描述。

二、为了从学术方法论的观点来研究翻译学问题，有必要开拓一系列有关的研究领域。

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认为，着眼于实践的翻译学起码缺乏理论性，这种研究只不过是一大堆几乎无法系统描述的实际工作中琐碎细节的堆积，其研究成果最多只具有信息数据的价值。对于上述的意见，大致上可以用以下三点加以驳斥或相对予以考虑：

一、任何以理解超语言现象为目的而进行的交际过程都要求语言行为具有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因而要按照该语言和语境所限定的句型来进行交际。这些句型从其总体来看即相当于今天所谓的“交际能力”，在同一语言集团的成员中起着规范的作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使语言交流受到一种类似自动控制系统的制约(就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生成因素，尽管据说创造性强，但实际上并非心智的活动而是十分机械的)。由此可见，语际信息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种规则的制约。所以任何翻译都是试图将支配两种语言(即原语和译语)行为的句法、词法和修词体系加以同步化，并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实际上翻译就是翻译能力和翻译行为受到原语和译语两种标准不同程度的影响、彼此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语言活动。

二、任何自认为具有最低限度科学性和相关性的经验归纳法都对其研究的领域有基本的理性认识，这些认识可以说或多或少是明确的，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反之亦然，没有任何有待证实或证伪的理论不需要以经验和数据为基础。经验和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三、以利用大量素材的方法而产生的科学研究成果都具有统计学的性质。这些成果并不自以为从语言学、心理学和信息学的角度涉及到一切有关翻译的实际情况。这是任何一门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也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只要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在说明统计方面的规律性问题上(尽管有的现象并不常见)并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

开展大量的调查工作越成功,那么,其实践和理论的信息价值就越高。

二、翻译——现代信息传递的工具

在属于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之间沟通信息，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语言行为的重要方式。由于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的理论及应用语言学系的影响，**Translation**这个词近来已经进入德语的词汇。在说德语的地区，这个词往往用来通称不同语种之间的口、笔译，表示语际的信息传递。翻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口译比笔译早。然而，究竟人类第一次语际信息交流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通商，军事，政治，文化），不同的语言集团又是怎样逐渐形成这种语际信息交流的，所有这些问题多半只能靠推测来回答，因而往往和神话、宗教传说混为一谈（Steiner 1975）。这就很可能将本末倒置，圣经故事中有关建造通天塔的一段便是一则例证。

“……人们并非因彼此言语不通才各奔他乡、散落四方的；而是**由于他们散落到四方才彼此言语不通**。通天塔故事把因果颠倒了”（Haugen 1974）。

豪根的意思是说，不要脱离多种族决定多语种这样一个总的背景来谈人类利用翻译来克服国际间交际上的障碍。多语种乃是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消除多

语种造成的种种困难，正是因为从事翻译的天生才能乃是他们具备的心智上的基本素质。因此可以说，他有责任创造一切条件进行巨大规模的翻译工作，以消除国与国之间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

过去，语际翻译的指导思想有两种，都是单向性的：不是想要别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听你的，就是去学习别的民族的成功经验。最近又增加了第三种指导思想，出于同其它民族进行双边谈判的需要，是双向性的，因而可以实现国际间的永久性交往。主要通过军事、科学以及工业等各个领域国际事务的交织，这些交往便可以表明各国之间形成的种种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一部分双边和一部分多边的信息交流，其范围之广泛足以使我们相信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地区性的冲突将逐渐消失，全球相互协调和“全世界文明进步”的思想将开始成为压倒一切的动力。毫无疑问，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崇尚文明的科技大进军，这些进程随时间和空间的缩小势必几乎遍及到全人类，引起全人类结构上的变化。只消以今天那些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总产值的六分之一，而且增长率还很高。以它们向外界绝对封锁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这些公司正日益试图影响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通过控制全世界的经济以主宰未来。而对公司的大政方针起着重大作用的则是产与销之间信息的不断反馈。

因此，鉴于今天的世界正开始由大规模信息交流向全球性信息交流的阶段过渡，科技和组织机构变得一天比一天复杂，翻译作为沟通国际间信息交流的工具，其重要性也必然与日俱增，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发展是客观上的有利条件

造成的。正如我在别处提到过的那样(Wilss 1974),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创造性的生产力, 但就其主要特点来看 可以说是一个复制信息、贮存信息、加工信息和传送信息的时代。在文学翻译的性质和作用方面曾发表过不少发人深思的理论的沃尔特·本杰明很恰当地将我们的这个时代称作“信息复制的世纪”。把这个时代称作“翻译的世纪”的那些人也同样是恰当的(Kloepfer 1967; Wilss 1974)。他们的话都说明了一个事实, 即当今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无论从地区和范围来看都远远超过了过去。这种情况说明,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过去许多世纪。翻译决定一本书能拥有多少读者, 甚至在评估畅销书的成功率时也要看它译成多少种外语。圣经至今仍是世界上译得最多的一本书。圣经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弗恩等人的作品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也就不言自明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长期信息传递的影响, 其中国外来的信息在许多方面同本国的信息几乎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施托里写道:

“在某一个特定时间里, 今天的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同时在从事翻译工作? 那些绞尽脑汁在自己安静而往往是简陋的书斋里从事翻译的文学翻译工作者, 乃是翻译界的基本成员, 可他们无疑只占极少数。在信息传递网的每一个枢纽上都有人在从事翻译工作。在国际通讯社、在报纸、无线电、电视台的各个部门; 在各国政府部门和外交使团; 在各种类型的国际性会议上; 在各国

的海关和边防哨所；在所有的进出口公司；在无数军事行政部门，包括情报机构的办事处或国际间联盟的军事机构；在电影制片厂；在各种国际交通运输部门……在各种场所包括旅馆、餐厅、轮船、工厂、高等学府，甚至家庭内热情接待一批又一批外国人的地方，……都在进行翻译工作。”(1969)

《翻译文献索引》最全面而详尽地反映了国际上文学与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翻译活动日益扩大的情况。这是每年出版的国际性翻译书目。这个工作从1932年开始，1940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刊，战争结束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复刊。

今天全世界大约有二百万科学家，他们之中许多人经常发表科学著作。由此可见，科学信息资料如何以空前的排山倒海之势不断地涌现出来。科伦大学医学系的茹道夫·克劳斯说，在一百年以前，一个医生每天只需花一个小时阅读资料就可以对医学方面的新成就了如指掌。但是，今天医学方面的知识每6年就翻一番；每年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多达150万篇。显然，现代医学可能还将继续迅猛地向前发展。

科学和技术不断扩展成庞大的集团，一部分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巨型综合研究机构所组成，便导致国际间信息传递的重重困难。例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目前由于外语水平差，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中有一半人无法阅读这方面百分之五十的出版物(Jumpelt 1961)。这不仅意味着许多专业人员得不到他们极想获得的科学信息，也意味着不得不从事许多重复劳动，这种重复劳动必然造成科研资源的滥